

李四龙 主编



佛学与国学

楼宇烈教授七秩晋五颂寿文集

时值楼宇烈教授七秩晋五寿辰，执教五十四年之际，
本书精选文辑四十余篇结成年文集，感谢楼先生对我国当代哲学、宗教学所做的贡献，
并祝愿先生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李四龙 主编

佛学与国学

楼宇烈教授七秩晋五颂寿文集

时值楼宇烈教授七秩晋五大寿、执教五十周年之际，
本书精选文编四十五篇，以成颂寿文集，感颂楼先生对我国当代哲学、宗教学所作的贡献，
并祝愿先生身体安泰，吉祥如意！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佛学与国学：楼宇烈教授七秩晋五颂寿文集 / 李四龙
主编.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11

ISBN 978-7-5108-0219-5

I. 佛… II. 李… III. ①佛教—文集②国学—中国—文集
IV. B948-53 Z1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2748 号

佛学与国学：楼宇烈教授七秩晋五颂寿文集

作 者 李四龙 主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厂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6 开

印 张 31.125 彩插 1p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219-5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楼宇烈教授与学生们合影

主 编

李四龙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李 焱 沙宗平 周学农

金 勋 徐文明 章启群

目 录



- 张志刚 再论宗教—文化观的方法论意义 / 1
- 姚卫群 拓宽佛教研究领域与加强国际合作 / 19
- 李四龙 全球化时代的三大佛教理念 / 26
- 张风雷 论“格义”之广狭二义及其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 36
- 周学农 僧肇的“立处即真”说 / 50
- 陈金华 佛陀跋陀共慧远构佛影台事再考 / 55
- 徐文明 佛陀跋陀罗离开长安的时间再探讨 / 65
- 菅野博史 《法华经文外义》研究序说 / 76
- 圣 凯 《十地经论》译者新探
——菩提流支主译说的成立 / 87
- 李海峰 《华严五教止观》的理论贡献及其禅修指导意义 / 101
- 俞学明 梁肃《止观统例议》读记 / 111
- 温金玉 戒律的传播与本土化
——从唐道宣与义净的弘律说起 / 126
- 石 刚 略论六祖惠能大师最后付嘱之教法
——兼谈宗宝本《坛经》的一个断句错误 / 139
- 满 耕 简论洞山良价的禅学思想 / 146
- 伍先林 论雪峰及其弟子云门文偃的禅风特色 / 155
- 金东淑 《宗镜录》的“禅教一致”思想 / 163
- 韩剑英 宋初孤山智圆“中庸”思想探析 / 177
- 黄夏年 三智之美与扶忠继忠 / 187
- 聂 清 禅宗中的言语行为 / 193
- 周 齐 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之再审视
——再看杨仁山再看近代佛教之复兴 / 204
- 何小平 领纳戒法于心 解行必须相应
——虚云老和尚论受戒及行持戒律 / 213

- 金 勋 韩国佛教的社会福祉理念与实践 / 223
- 王 颂 明治时代的日本佛教现代化动向一瞥 / 233
- 张文良 日本佛教界对战争的反省与批判
——以袴谷宪昭的战争批判思想为中心 / 245
- 远藤敏一 上座部佛教从“自度”到“普度”的演变 / 258
- 管道华 略论部派佛教的“三科假实”之争
——以《异部宗轮论》为中心 / 265
- 杨 东 略论中观与唯识在自性、二谛等佛学要义上的异同 / 280
- 何欢欢 《维摩诘经》经名辨析 / 295
- 闵 军 佛教出家思想对管理的意义 / 308
- 李 巍 大乘佛教的慈善观 / 322
- 释正觉 慈善无相
——胜鬘居士三大愿浅说 / 327
- 戈国龙 禅思随感录 / 334
- 陈探宇 理事之迷思 / 343
- 刘成有 人间佛教思想中的儒家精神 / 351
- 王中江 儒家“仁爱”精神的“普世性”与“终极性” / 358
- 谢路军 《老子》中的经济学思想管窥 / 368
- 罗 翔 “修身”和“治国”的论辩
——荀子对孟子学说的批评 / 381
- 章启群 《月令》思想再议 / 391
- 张志强 王阳明《大学》论与“朱陆”问题的展开 / 399
——兼论王学流衍与“朱陆”问题在晚明背景下的重构
- 李虎群 马一浮论儒家诗教大义 / 411
- 沙宗平 抒此时艰，奠我中夏
——兴中会的现代意义初探 / 425
- 张 敏 水原华城与茶山的经世思想 / 447
- 金钟弘 东西理想人格之辩 / 460
- 陈中浙 传统书画的社会作用与政治意义 / 468
- 贾瑀铨 中国古琴与传统文化论要 / 480

再论宗教－文化观的方法论意义

张志刚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

笔者按：为庆贺楼先生七十寿辰出版文集时，我曾撰文《宗教学是什么：一种“宗教－文化观”的阐释》一文。宗教学的理论与方法是我多年来的研究重点，“宗教－文化观”则是我为推进宗教学基础理论建设所做的方法论尝试，而我从哲学转向宗教学，并致力于探索宗教－文化观，皆深受楼先生指教。写作本文过程中，其部分内容陆续发表于“东亚宗教文化学会成立纪念国际学术大会”（2008年8月，韩国釜山，主题发言“论宗教－文化观的方法论意义”）、《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四期，《宗教与国际热点问题——宗教因素对冷战后国际热点问题和重大冲突的深层影响》）和《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四期，《再论宗教－文化观的方法论意义》）。此文经过认真而全面的修改充实，作为五年前所写文章的续篇。

无论对我的祖国、我的专业还是我的学业来说，2008年都是特别值得纪念的。三十年前，中国大陆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宗教研究也随之在中国学术界开始恢复了，我个人则有幸通过“文革”后的首届（77届）高考走进了北京大学，就读于具有深厚宗教研究传统的哲学系。孔子曰：“三十而立。”值此“个人学业的而立之年”，我很愿意与同行们分享一下我在宗教－文化观上的学术收获，因为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直跟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宗教学界的探索步伐，其点滴收获或许可看成这段学术史的“局部缩影”，为我们纪念“中国宗

教学重建三十年”，并推动其基础理论建设提供些许参考线索。

本文标题之所以冠以“再论”二字，自然是感到有必要来进一步阐发宗教—文化观的方法论意义。此种“再论”大体上是这样展开的：首先是历史回顾，简要回顾了相关的学术背景和我对宗教—文化观的探索过程，此为“再论的起点”；接着是对一种流行观点的理论反思，以提出值得反省的方法论问题；最后则是一种学术尝试，即用宗教—文化观来探讨“宗教因素对国际热点问题和重大冲突的深层影响”，此为“再论的目的”——检验此种方法论是否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研讨重大现实问题。

一、历史回顾：学术背景与探索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可谓中国大陆的宗教学迅速恢复并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者（主要指年过五十的、从事宗教研究的专家学者）大多会对“一段思想往事”记忆犹新，这就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宗教学界经历了一场“思想解放”或“观念转变”——从“宗教是鸦片”到“宗教是文化”。这十多年间，宗教学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尚处于恢复重建阶段，所以这一场“思想解放”或“观念转变”的重大影响可想而知。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学家牟钟鉴先生在本世纪初回顾道：“宗教是文化——这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学界、宗教管理部门、宗教界的新的共识，它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能从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看待宗教，从而避免了认识上的片面性与狭隘性，使宗教研究进入一个广大的天地。”^①

一般认为，改革开放后关于“宗教是文化”的说法，最早是由赵朴初先生提出来的。对此说法，学者们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例如，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宗教是一种文化传统，宗教富有文化底蕴，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体系，世界上有诸种“宗教性质的文化类型”等等。或许是由于深受早年哲学专业训练的影响（也可以说是一种专业局限性），我本人不太满足关于“宗教文化”的一般提法或具体描述，而试图从基础理论上深思作为一种新方法论的“宗教—文化观”，以提炼、论证并阐发这种新的方法论观念对于推动宗教研究的重要意

^① 牟钟鉴：《探索宗教：一个研究者的心迹》，《探索宗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64页。该文写于2000年，最初发表于《宗教》（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主办）2000年第4期。

义。

我对于“宗教 - 文化观”的研究大约始于 1985 年，早期的学术收获主要写成一篇长文和一本专著，即 1991 年发表的“在宗教与文化的交汇点上——论宗教观念的一种现代形态”和 1993 年出版的《宗教文化学导论》。^①构思此书时，我主要是这样想的：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下，若想在中国学术界恢复重建宗教学，无疑要从基础理论做起，探求一条既能与国际先进学术水平相接轨，又富于开拓创新精神的方法论思路。经过五六年时间的广泛研读，我以为这样一条思路起码应在如下几点“出新”：(a)“纳新”，即能够广泛采纳晚近国际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有影响的或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b)“创新”，即通过反思与整合这样一些学术成果能够提炼并论证一种新的宗教学方法论观念；(c)“更新”，即由前两步研究工作所阐发的新方法论思路，不仅可转换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对宗教研究的简单化观点，而且有助于更新“现代人的宗教观”——现代文化背景下流行的宗教观念。

《宗教文化学导论》便是上述立意与思路的早期成果。就结构而言，全书的八章可归为三部分内容：(a)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设，在当代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文化研究与宗教研究已被推向了学术前沿，而在二者的交汇处或结合部，一种新的方法论观念——“宗教 - 文化观”已见雏形，一门新的人文学科——“宗教文化学”也在孕育之中；(b)评介了六个研究范例，马林诺夫斯基 (Bronislaw Malinowski) 的文化人类学，韦伯 (Max Weber) 的宗教社会学，道森 (Christopher Dawson) 的文化史学，汤因比 (Arnold Toynbee) 的历史哲学，蒂利希 (Paul Tillich) 的文化神学，卡西尔 (Ernst Cassirer) 的文化哲学；(c)初步阐发了“宗教 - 文化观”的主旨要义和“宗教文化学”的学术潜力。此后，我又在多种论著中，像《走向神圣——现代宗教学的问题与方法》(1995)、《宗教是什么》(2002)和《宗教研究指要》(2005)等，一点点地充实了关于“宗教 - 文化观”的方法论意义的论证和阐释。这里简述如下：

① 《在宗教与文化的交汇点上：论宗教观念的一种现代形态》，《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宗教文化学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首版；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台湾：世界宗教博物馆基金会（宗博出版社）2005年繁体字版。

1. 新方法论立意

所谓的“宗教－文化观”，是我通过比较与综合上面提到的六个研究范例所共有的方法论倾向而概括出来的。我之所以将其称为“宗教－文化观”，是因为这种方法论观念旨在：广泛借鉴当代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大量成果，尤其是对“宗教”与“文化”这两个基本范畴的重新阐释，着意强调宗教与文化之间存在的那样一种由来已久、错综复杂的内在关系，以及此种关系对于全面而深入地研讨宗教现象的关键性意义。

从学理上讲，这也就是把“宗教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推到了首要位置，作为整个研究过程得以起始、展开与回归的“元问题”或“基本关系”。在这一“元问题”或“基本关系”里，所谓的“文化”与“宗教”已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以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杂多含义，重新获得了一种基本的规定性：前者所涵盖的是“人类历史活动的整体或过程”，后者则意指“一种基本的历史现象或文化传统”。这样一来，“宗教”与“文化”便构成了一对相互依存的“关系范畴”，从而既为整个宗教研究奠定了一个新的“逻辑起点”，又开拓了一个观念更新、视野开阔的“解释意域”（意义解释范围）。

2. 学术启发举要

首先，若以宗教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作为“逻辑起点”或“解释意域”，可使我们在现有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认识水平上，更为充分地认识到宗教现象的丰富文化意蕴。与传统观念相比，所谓的“宗教”在“宗教与文化”这个新的解释意域中不再简单表现为“抽象的精神信仰”或“其他某种单一的特质”，其诸多层面的文化意蕴得以呈现出来了，像传统的、习俗的、心理的、情感的、意志的、体验的、价值的、目的的、人性的……就此而论，我们能否说作为一种历史传统或文化习俗的宗教是非现实的或不重要的呢？能否说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宗教徒的心理、情感、意志、体验等是虚幻的或愚昧的呢？能否说他们所追求的价值、目的或人性是远离尘世的或没有意义的呢？显然，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宜做出简单的或武断的回答。相反，宗教学诸分支的大量成果表明，宗教现象所固有的上述诸多层面的文化意蕴，是值得重视、需要探讨、有待深入解释的。

其次，若以宗教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作为“逻辑起点”或“解释意域”，并意识到宗教现象的多重文化意蕴，那么，以往讨论的宗教信仰与人类生存形式及其主要活动方式的诸多关系，像宗教与文化、宗教与民族、宗教与社会、宗教与政治、宗教与经济、宗教与法律、宗教与伦理、宗教与哲学、宗教与科学、宗教与文学、宗教与艺术等，便不能孤立地或片面地予以考察了，而应该一并纳入宗教与文化“这张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之网”来重新加以全面认识了。譬如，能否因为某种宗教在某一历史阶段的愚昧思想专制、残酷政治迫害或狂热战争行为，就完全否定宗教信仰在其他诸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呢？反之亦然。譬如，能否只讲正面的或积极的影响，而不论负面的或消极的作用呢？

最后，若把宗教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作为新的“逻辑起点”或“解释意域”，一系列深层理论问题，像宗教与文化差异、宗教与文化形态、宗教与文化传统、宗教与文化心理或文化潜意识、宗教与文化传播、宗教与文化冲突、宗教与文化交流或跨文化对话等，也将被提到我们的研究日程。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其意义显然不仅仅限于揭示宗教现象及其问题的复杂性了，而是把我们推向了当前文化研究领域的热点、难点、交叉点和突破点。

上述几个要点表明，无论就宗教研究的对象、范围还是重大问题或前沿课题而言，宗教 - 文化观皆有助于拓宽并深化我们的学术视野，以形成一种更为成熟的方法论观念。在我看来，尽管在国内外学术界现已很少有人否认“宗教是文化”了，但这种提法所深含的方法论观念却并未得到普遍的重视，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目前流行的一些宗教理论观点仍带有宗教 - 文化观所力求克服的诸种方法论缺陷。为避免抽象的议论，我从自己的“一段理论遭遇”来引出问题。

二、学术反思：流行观点的方法论问题

2006-2007 学年，我在法兰克福大学担任 DAAD（德国学术交流基金会）客座教授。在这期间，我曾以 *The Study of Christianity in Mainland China: A*

Reflection Focused on the Last Two Decades 为题做过四次讲演^①，地点为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海德堡大学、马尔堡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该讲演旨在阐明一个“背景问题”：为什么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学者要重视基督教研究？一再出乎预料的是，前两次讲演的提问讨论阶段，我遭到了同样的诘问。两位德国学者几乎是用一模一样的语句甚至语气反问道：为什么中国学者还要研究基督教呢？过去的几百年里，基督教在欧洲社会已经没有多大影响了。这的确有点让人下不了台，好像我是在“班门弄斧”，跑到“人家的高等学府”来高谈“人家的宗教传统”，可人家的学者早就不把所谓的基督教传统放在眼里了。

好在领教过“一次教训”并做过反驳，我在海德堡回答同样的诘问时显得更不“客气”甚至有失“儒雅”。提问者是一位女士（讲演后我才知道她现任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主任），我的回应大致如下：我上次来海德堡时就冒雨赶到了内卡河边，首先不是欣赏美景，而是去朝拜那幢白色的楼房——马克斯·韦伯故居（Max Weber Haus）。我冒昧地讲，您或许不知道韦伯曾在海德堡长期生活和工作过（当然这是不太可能的），但我敢肯定，您没有读过、至少是没有读懂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在这里提到这位名人及其名著，并非出于“个人崇拜心理”，而是像许多同龄的中国学者一样，试图“接着韦伯等一批杰出学者所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来讲”，这就是“现代性与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回到我的讲演主题，有必要重复一遍我的讲演稿里因时间限制而没能详述的一段论证：改革开放初期，即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使长期封闭、落后的国家尽快赶上全球现代化的潮流，使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是为了探索“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问题”，中国大陆学术界在痛思本民族的现当代史，深刻反省中国社会在过去几百年间之所以落后的历史原因的同时，把目光转向了“现代文化”的发源地——欧洲，以期通过广泛而深入的“文化比较研究”——不再限于经济、政治、法律、科学等方面的具体比较，而且围绕着晚近国际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讨重点之一——现代性与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深究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异同及其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可以说，正是在上述学术背景

^① 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该讲演稿的中译文，《“中国大陆学术界的基督教研究”反思：着眼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性评论》，卓新平主编：《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基督教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33—50页。

下，其研讨意义深及西方现代文化的起因、广及中西方文化传统比较的基督教研究，才引起了中国大陆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空前重视。^①至于您提到的基督教对现今欧洲社会的影响，您生活在欧洲，有切身的经验，比我更有发言权。但我想指出的是，就这几百年欧洲社会的情况而言，您的看法也许是对的，可从整个欧洲史来看却并非如此，如果再考虑到目前引人关注的“全球宗教复兴现象”，问题恐怕就不这样简单了。

对治学者来说，问题是“思想的财富”，问题越犀利越好，越发人深思。上述讲演中碰到的问题便让我至今不能放下。乍看起来，这个问题似乎不必太上心，因为我的前两次讲演是在汉学系，提此问题的两位德国教授也是搞汉学的，后两次讲演的听众则多是宗教学专业的；再说了，这个问题是针对基督教及其研究的，并不直接涉及宗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可一旦认真想想，这个问题其实更值得深思，因为在所谓的宗教学已被“专业化”，而且处于“边缘化”的学术背景下，这个由“外专业的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出的问题，或许更能反映当今知识界对于宗教现象和宗教研究的“流行观念”。这是我考虑到的第一点，即“问题的意义”。

第二点，问题何在呢？在前述问题中，提问者所强调的“时间概念”给我印象尤深，因为其观点是立论于“这几百年”的，即“从这几百年来看，基督教在欧洲社会已经没有多大影响了”。那么，“这几百年”是什么概念呢？对欧洲社会来说，这大概就是指现代西方文化形成以来的几个世纪。在我看来，无论怎么界定、描述或解释所谓的“现代文化”或“现代性”，大多数学者都不会否认，这几个世纪里，不仅在现代文化的发源地——欧洲，而且在所有那些已被卷入现代化浪潮的地区或国家，最有影响的社会因素是经济（市场）、科技（自然科学和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等。就这一普遍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事实而言，我们理应看到，提问者的观点是很实际的，或者说，是有其不可忽视的社会根据的。按照我的理解分析，这应该就是“提问者眼里的问题所在”。但我想进一步指出的是，这只是“问题的一半”，“问题的另一半”在于，提问者的观点是否也存在着值得反省的“理论问题”，尤其是方法论问题呢？

第三点，理论问题何在？前述提问者的观点首先令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

^① 关于这段论证，可详见《“中国大陆学术界的基督教研究”反思：着眼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性评论》，载《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基督教卷》。

如果我们的眼界只限于“这几百年”，能否足以认识宗教现象呢？众所周知，宗教可谓古老而普遍的历史现象。世界上现存的诸多宗教传统，像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印度教等，不仅曾对人类社会有过重要的影响，而且均已化作或融入了东西方文化传统。就此而言，若像前述提问者那样一味强调“这几百年”，其观念是否尚嫌“短浅”，是否不可能全面地认识宗教现象呢？这并非一种简单的疑问，它包含很多值得反省的“方法论观念问题”。譬如，我们的眼界能否只限于“这几百年”，就认为宗教传统对人类社会已没有多大影响了？我们的眼界能否只限于“这几百年来基督教在欧洲社会的影响”，就认为诸种宗教（包括基督教）在其他地区或国家也没有多大影响了？我们的眼界能否只限于“这几百年来宗教传统在知识界的影响”，就认为宗教传统对于平民百姓也没有多大影响了？我们的眼界能否只限于“这几百年来经济、科技和理性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重要影响”，就断定“宗教将被科学、哲学或美学等所取代”，或认为“宗教信仰已变成了个人的或私人的事情”，“诸种宗教也变成了市场现象，也主要是工具理性的选择结果”……

中国有句俗语：站得高，看得远。它形象地喻明了一个道理：人们的视野是取决于立场的。这个通俗的哲理是否也适用于宗教研究呢？如果能把前面一再追究的“提问者的观点”看作“一种思维范式化的流行观点”，并像前面分析指出的那样，不但从“时间”（文化或社会通史的角度），而且从“空间”（不同文化或社会类型的角度）来反省“提问者的立论根据”——“这几百年”，那么，这几百年来还有多少种“现代性的宗教观”局限于类似的“短浅视野”呢？诸如“宗教消亡论”、“宗教世俗论”、“宗教私人论”、“政教分离论”等，是否皆以这样或那样的视角立论于“这几百年来的宗教现象”，以致未能深及宗教信仰的本质，并全面考察宗教传统的社会作用或文化功能呢？

需要慎重说明的是，笔者提出这一连串疑问，绝无全盘否定前列诸种宗教理论观点的意思，而是本着学术探讨所应有的“扬弃的态度”。学术史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思想过程。凡在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理论观点，无疑均有这样或那样的合理性，它们或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或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或做出了某种不可忽视的历史判断……前列几种在现当代宗教思想史上有影响或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也是如此。所谓的“扬弃的态度”，就是要在充分吸取以往理论观点的合理成分的前提下，进而察觉现存的不足，特别是尚待深入

探讨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建设性的学术态度，我接着来谈谈自己新近的理论尝试。

三、理论尝试：宗教与国际热点问题

自2003年底至今，我一直在负责主持一个课题“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宗教冲突与对话研究”。这几年来，通过广泛参阅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加之逐步思索，我对这个重大课题的研讨思路主要形成了如下看法：尽管“宗教冲突”已成为国内外新闻媒体上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字眼儿，可认真研究起来，“单纯的或直接的宗教冲突”并不多见，而且规模较小，尚未发展到左右全球形势的地步。这便意味着，所谓的“宗教冲突”大多是以复杂的形式反映出来的。正像钱其琛副总理早就指出的那样，冷战结束后，宗教、民族问题突出起来了，许多国际热点问题差不多都与宗教、民族问题分不开。冷战后的宗教问题有这样几个特点：(a) 宗教经常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b) 宗教自由经常与人权问题联系在一起；(c) 宗教经常与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d) 宗教经常与国家的政局、民族的分裂或统一联系在一起；(e) 宗教的认同往往跨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所以，我们必须注意研究宗教问题^①。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发生后，宗教问题的重要性和严峻性更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促使国内外专家学者回首冷战前后国际局势的巨变，重新思考宗教因素对于诸多国际热点问题和重大冲突的广泛影响。国际问题研究专家陆忠伟指出，波黑冲突、北爱尔兰问题、印尼马鲁克群岛与亚齐问题、克什米尔纷争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冲突，无不包括愈益复杂、愈益增强的宗教因素。“可以说，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万变不离其‘宗’。宗教、民族问题是‘9·11’事件后驱动国际政治的一股重要动力，并引起了国际局势的痉挛性波动。”^②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现实问题：为什么宗教因素会对冷战结束后的诸多国际热点问题和重大冲突产生如此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呢？在我看来，捕捉住这个重大现实问题，不但可充分把握“当代宗教冲突与对话研

^① 参见钱其琛：《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若干重点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9期。

^② 参见陆忠伟：《国际冲突中的宗教因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著：《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序”，第1-2页。

究”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且很有可能在宗教学基础理论上有所突破，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宗教现象的复杂特性、社会作用或文化功能。下面概要介绍的便是我近来的理论尝试，即试用宗教—文化观来探讨上述重大现实问题，其主要思路为，力求阐释宗教因素及其影响的错综复杂性，以揭示宗教因素或宗教背景对于冷战后国际热点问题和重大冲突的深层影响。

1. 宗教因素及其影响的积淀性

冷战之后诸多国际热点问题和重大冲突越来越深受宗教因素的影响，这是一个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但宗教却属于古老的文化现象。正因为宗教与文化有着悠久而深邃的关系，倾心研究文化史或文明史的思想家，大多重视宗教传统的社会作用或文化功能。关于这一点，我在长期的宗教—文化观研究中深有体会。马林诺夫斯基、韦伯和卡西尔等人的理论学说是国内学者比较了解的，这里简要评介汤因比和道森在宗教传统的社会作用或文化功能研究上的学术启发。

汤因比长达 12 卷的《历史研究》陆续发表于 1934—1954 年，其缩写本（英文版 2 卷，中译本 3 卷）也于上个世纪 60 年代就在中国翻译出版了。但是，大多数学者（包括西方学者）是把它当成历史学名著来读的。其实，该书主要是一部以“比较文明史”为视野的历史哲学著作，因为其理论建树主要在于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观——文明形态史观，而并非作者当年就人类文化境况、特别是“西方文化命运”所做出的那些判断或结论。通览这部巨著，作者所潜心的历史解释思路就是，系统梳理宗教传统与文明社会（广义的文化）的源流关系，通过比较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 26 个文明社会，力图揭示人类文明形态形成演变的基本模式，深入考察诸种宗教传统在文明形态的起源、发展、衰落与解体过程中的重大社会历史作用。在汤因比看来，作为人生根本态度的宗教信仰可谓一个个文明社会的“生机源泉”或“精神纽带”，一旦某个文明社会失去了其传统的精神信仰，势必走向衰落，或在内部陷入社会崩溃，或从外部遭受军事攻击，直到被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所取代。为什么这么说呢？汤因比认为，千百年来各大宗教传统之所以能吸引众多信徒，就是因为它们分别对应于人类的几种主要心理类型，从而满足了各类信徒在不同的文明形态下切身体验到的情感需要。所以，文明社会的全部活动，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正是靠宗教